

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论文

积极开展人口社会学研究,为攻克 人口问题难点作贡献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田雪原在第三届全国人
口社会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人口学和社会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存在,都已经历了100多年和200多年的历史。中国对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可以追溯很早,但将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是本世纪二三十年的事情,当时出了一批以陈长蘅、许仕廉、陈达、吴景超、李景汉为代表的人口社会学派,发表了《中国人口论》、《中国人口问题》、《人口问题》等论著,主要从社会学角度阐述了人口节制主义。然而1953年高等学校取消了社会学。不过,50年代中期上述社会学家中的一些人,还有费孝通、孙本文等致力于人口研究,结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阐述了节制生育的主张。同时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全文发表,邵力子先生等也力主控制人口增长,一时间人口研究竟打出一个“小高潮”。后来的结局是人所共知的,马寅初遭批判,上述多数社会学家也被打成右派,人口学成为事实上的“禁区”,人口社会学研究中断了20来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错批错划的平反,人口学、社会学重新迎来发展的春天,人口社会学研究始有柳岸花明。1979年3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会研究会;同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成立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随后正式成立中国人口学会,为人口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开阔了道路。10多年来成绩斐然,出版了一批颇有份量的论著,针对现实存在的人口问题也提出很有见地的报告,从而使人口社会学研究构成当今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支柱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人口社会学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和实际人口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口问题的“热点”和难点,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推出一组既有较高学术价值,又有较强实证研究意义的科研成果,并在这一研究中发现、培养和造就人才。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提高队伍的理论素养。由于前面提到的历史的原因,人口社会学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为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取当代人口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成份,特别是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我所用。譬如,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结构功能理论、符号互动理论中哪些是科学的,可以借鉴的,结合中国实际,做出卓有成效地研究。不言而喻,我们还应当继承中国社会学会研究中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抽样调查现已在人口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但是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对于由非抽样误差引起的调查资料的不尽准确,抽样调查就束手无策。社会调查中的开调查会、典型调查等,在一些问题上则可以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吸收国内外已有科学成果是必要的，但吸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同时，也只有在同实践结合的应用中才能真正吸收，才能向前发展，形成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研究。因此，人口社会学的深入可密切注意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革，紧紧抓住当前人口问题的“热点”和难点展开。主要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观念转变问题。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重大改革相继出台，所有制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分配关系经历着变动，从而使边际孩子的成本——效益受到新的驱动，强烈地策动着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们的生育意愿。大体说来，在本原上市场经济体制对生育率的下降是有利的，这在当今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健全、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已有体现；在现实上，在生产力不发达和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则又有若干不利影响。从社会学角度观察，人们的生育观念正经历着时代的振荡，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由多生、多育向少生、优生、优育、优教方向转变，无疑是一个既现实又关系到下一个世纪的问题。

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目前有4种认识：偏高、略高、基本正常、正常。但从动态上看有增高的趋势，无论如何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增高的原因是人们的性别偏好，可是这种偏好古已有之，且不一定比现在逊色，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显得突出，同社会环境和技术手段关系怎样，严重后果在哪里，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亟待作出科学的研究。

人口数据资料准确性问题。中国人口资料可信度较高，但近来这方面也发生一些问题。国家计生委领导亲临湖北、河北调查，发现漏报率较高，但也有的地区认为自己的人口数据准确率很高，不存在漏报问题。所以，对人口数据准确度现状怎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采取什么样的决策和措施加以纠正？都需要做出深入研究。

流动人口和民工潮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估计在8000万至1亿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构成人口流动的主旋律，劳动力市场正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从流向上看，一是从乡村涌向城市，二是自内地流向沿海、沿江河地区，由不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依据“推拉”理论，劳动力和整个人口的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它必然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流动人口大增且集中流向发达地区的后果：它使交通全面紧张，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车站、码头爆满；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困难增大；流动人口犯罪率高，恶性案件上升；盲目流出地区生产建设受到一定影响，产生新的问题。在人口问题上突出的是计划生育管理问题，从上到下多次强调紧抓狠抓，但收效不很理想。因此，在中国由温饱向小康过渡，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时期，究竟怎样认识人口流动和民工潮，怎样除弊兴利、因势利导，有待拿出科学的研究结果。

人口城市化问题。这个问题同人口流动、人口迁移很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市化步伐加快，且打破原来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卫星城、农民城、准城市户口等新的创造，许多已收到明显社会效益。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既定的限制大城市规模、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是否可继续下去？“取消户口、打开城门”的主张是否可行，如不可行，原因又在哪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城市化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推进？

人口老龄化是出生率下降的必然趋势，是实现人口“0”增长并过渡到稳态人口不可超越的阶段。一定程度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需的。目前，在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和基本方略上，仍有“加速”老龄化和“延缓”老龄化之歧见。然而无论“加速”还是“延缓”，都必须面对现实。中国将以比较快的速度走向老龄化，各种预测表明，

本世纪末将基本进入老年型年龄结构，下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将达到严重阶段。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中国将以老年型年龄结构跨入小康，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即达到老龄化严重阶段峰值年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较经济发展有一个“提前量”，出现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恐怕这是我们真正的困难所在。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超前研究已经取得不少可喜成果，但一是需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老龄问题作出进一步研究，二是有必要从总体人口发展战略中再度审视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影响，对此给予科学地阐述。

人口与社区发展问题。社区作为区域化的社会，在人口控制和整个人口再生产中充任“中观”调节角色，起着国家宏观调节和家庭微观调节起不到的作用。在这方面各地创造了不少典型经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将人口控制同致富奔小康、建立幸福家庭结合起来的做法，需要从理论上、政策上、管理上、效益上加以总结、提高、升华，并吸收国外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走出一条区域性人口、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子。

人口和人权问题。国际上有少数人别有用心，用人权攻击和要挟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多数人还是不明真相，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听见风就是雨，人云亦云。对此我们要义正辞严，同时也要用科学的态度阐述什么是人权，个人的人权与集体的人权，我们实行计划生育怎样维护和发展了集体的、全民族的人权，从而在根本上保护和保障了个人的人权。同时对少量的、个别的侵犯人权行为也要做出科学分析，秉公裁断，落实人权保障。还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通过经济的、行政的、立法的手段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人权。这不仅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新形势下做好人口控制工作的需要。

以上8个问题经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原则同意组织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最有研究的同志深入研究，力争用确凿的材料，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提出具有一定理论高度和切中实际要害的观点，推出一批研究成果。此项动意尚在筹划之中，需要得到学术界同志们的支持和努力。这些问题同人口社会学关系密切，应当作出新的成绩，使人口社会学不断向前发展。

在中国人口科学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人口社会学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当前在加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进程的新形势面前，又为人口社会学研究拓宽了领域，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要看到，今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许多是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要在新形势下发展人口社会学，同样有一个真正抓住机遇，勇敢面对挑战的问题；还要有从事科学研究那种败不馁，胜不骄，百折不挠，永远进取的精神。这里我想起朱元璋和刘伯温在不同环境下的两幅对联，或许值得一番思索。

一次是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连吃几个败仗，在皖北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叹道：“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刘伯温立即应道：“国乱民怨，王不出头谁做主。”鼓励朱元璋不要灰心丧气，率领众将士战斗下去。经过不屈不挠战斗，终于迎来战局的好转。

另一次是攻打姑苏城，朱元璋得意激动之情难禁，信口道出：“天下口，天上口，意欲吞吴。”刘伯温及时提醒校正：“人中王，人边王，志在全任。”让朱元璋清醒认识到打下苏州城仅是局部的胜利，夺取全国的胜利才算全任。

我想，我们人口社会学研究确实任重道远，能够通过这次学术交流检阅已经取得成果，更重要的是瞄准先进水平，通过立足现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入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